

奏响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台盟篇章

全国政协委员 孔令智



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漫谈群”开设的“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专栏，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孔令智讲述了75年来，一代又一代台盟人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团结合作，走过光荣历程的故事。



▲ 1949年9月27日，台盟政协代表田富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响应伟大的号召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迅速响应，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参与筹备新政协，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5月1日，台盟在香港出版的新华社丛刊《新台湾丛刊》第6辑，开卷首篇为标明“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的新华社电讯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今年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二篇题为《一个响亮的号召》，对“五一口号”予以热烈响应。

《一个响亮的号召》文中呼吁：“一切爱国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必须在这个胜利的前夜加强各方面的工作，加强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更虚心地去征询和收集他们对于将来人民代表大会和联合政府的意见，准备好一切迎接新形势到来的必要条件。让我们为担负起历史所赋予我们这一代的重要任务而胜利前进吧！”

另一篇《响应伟大的号召》明确表示：“今年劳动节由中共中央发布出来的纪念口号，是给全中国人民的一个奋斗指针，而对蒋管区的全体被压迫的人民，无疑的也是一枝鲜明的标志，全国人民无不一在希求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赶快实现。所以听到这个伟大的口号，我们觉得每一个中国人民都必须立即更加团结起来，为着争取全国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1948年5月7日，台盟在香港《华商报》公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广泛地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的各种斗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

台盟前辈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

台盟中央原副主席田富达第一次与毛泽东主席握手，是在1949年的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大会安排田富达代表台湾高山族发言：“发言完了我实在控制不住了，跑下台去到毛主席那里跟他握手。他身旁没有什么警



▲ 1950年，部分台盟团团员欢送参加抗美援朝的黄辛涛(又名黄辛,前排左三)同志。

卫，会场中间是过道，毛主席在东边第一张桌子后面坐着，西边第一个是朱总司令。我去握手的时候很激动，话也说不出口，只说了一句毛主席好，主席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太激动了！”

田富达第二次与毛主席握手是在北京饭店，那是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这时的田富达已经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了。他回忆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见代表时，别人就介绍我，这是台湾的少数民族。想不到毛主席一下子认出我来。我一激动，上去就握手了。本来规定是不许握手的。回去以后我向国家民委主任检讨，我说对不起，我犯错误了。他说没关系。”田富达至今仍珍藏着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民委委员通知书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成为他心中最珍贵的回忆。

20世纪60年代，蔡子民在中日友好协会任职，经常有大量的迎来送往活动。他负责联络解决客人提出的要求，其中很多就是希望见到周恩来。为了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每接到中日友好协会送去的报告，不论多忙，总会抽出时间安排会见，蔡子民也总作为中方陪同人员参加。回忆起会见的过程，蔡子民深情地说：“周总理习惯于晚间工作，所以接见外宾的活动一般都安排在半夜。他把一天的政务工作忙完之后，再把我们叫去，交代一些要注意的问题。每次会见，周总理都能从中

日两国的前途出发，分析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说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他讲得十分精辟，令日本客人听了很折服。”

日本有个创价学会，属于宗教组织，但也进行一些政治活动。一天，创价学会的成员来访，中日友好协会的同志拿不定主意是否接待，便请示周总理。当晚9点多钟，周恩来召集从事对日本工作的同志开会，一个个地询问：“创价学会是怎么回事？”好多人被问住了。此时蔡子民介绍了一些情况，周恩来很满意，大声说：“你怎么坐在后面？”“到前面来嘛！”使当时还是个年轻人的蔡子民感到很温暖，也很激动。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台盟力量

1950年6月25日，美国武装干涉朝鲜战争。1950年6月29日，台盟总部主席谢雪红对新华社发表谈话，她说：全国人民，特别是台湾同胞应该一齐奋起，起来响应周总理的号召，以我们人民的力量来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以人民的力量来保证“台湾属于中国”这个“永远不能改变”的事实。随后，台盟总部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广大台湾同胞团结起来，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台湾，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

在此期间，台盟总部积极动员盟员和生活在大陆的台胞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其中，台盟盟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谢知母参加美国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工作，在查清和揭露美帝发动反人类的细菌战罪行中积极有为，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丁光辉、蔡管仲、魏正明荣立中国人民志愿军三等功，林东海、王宏荣立四等功。

盟员林东海参加第一批赴朝作战。一次，上级命令林东海带几个人往敌后的小山沟侦察，寻找敌人防守薄弱之处。林东海带领侦察小分队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敌人背后的山路。我作战部队通过这条地道对敌人发起进攻，一举歼灭了据守柳潭里的美军。林东海因提供了准确的情报而荣立四等功。

盟员黄辛在朝鲜一共待了3年4个月，经历了从二次战役到五次战役，直到后来坑道里的战斗。他说：“打仗确

实不容易，那时我们部队装备比较差，后勤供应也很困难。我们的部队经常是打得很快，穿插进去把敌人围住了，但给养跟不上，弹药也用完了，无法继续战斗，围住的敌人照样可以跑，为此吃了很大的亏。战士们太辛苦，在前线吃的用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在司令部刚开始的时候也经常断粮，我们就找野菜吃，后来后勤工作跟上去后条件才得到改善。”

盟员蔡管仲参加了北京市第一批抗美援朝手术队，亲自带领他的几个学生，奔赴前线，抢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伤病员，使他们早日得到救治，转危为安，荣立三等功。据他的子女回忆：“父亲特别珍惜那段经历，把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的照片，珍藏镜框中，经常回忆起那段难忘的日日夜夜。”

参与抗美援朝前线慰问

抗美援朝期间，我国人民先后组织派遣了三批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包括台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了慰问前线活动。

1951年4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正式组建完毕，团长是廖承志，副团长是陈沂和田汉。台盟总部积极发动盟员和同乡给朝鲜前线写慰问信，并派盟员周明同志代表台盟参加了第一批中国人民慰问团。周明与其他民主党派代表们深入前线，带去了祖国人民的慰问金、慰问品和慰问信，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慰问伤病员，向他们送去了温暖与敬意，鼓舞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意志。

在祖国大陆，台盟总部秘书长杨克煌和台盟华东总支主委李伟光代表台盟亲赴各军属家中，送锦旗和鲜花，表示慰问，对有困难者送慰问金。台盟华南总支部专门制作一面印有“卫国干城”的锦旗敬献给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的号召》。6月6日，台盟总部发表谈话，号召旅居大陆各地台湾同胞大力开展捐献武器运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台胞积极响应。旅居上海的台湾同胞情绪高涨，纷纷前往台盟华东总支支部响应号召。经过数日酝酿和协商，于6月10日由台盟华东总支支部牵头成立“台湾旅居上海同胞抗美援朝捐献武器运动委员会”，大力开展捐献武器运动。

台盟总部积极发动和组织台湾同乡共约百人，参加欢迎“赴朝慰问团”归来的大会，并听取参加“赴朝慰问团”的台盟代表周明作《关于中朝人民英勇抗美援朝情况》的报告、苏新作《关于台湾近况和台湾人民盼望早日解放情形》的报告。

经过数次集会，台盟盟员和台胞普遍认识到抗美援朝和解放台湾的密切关系，踊跃开展抗美援朝捐款活动。其中，谢雪红带头捐献300万元（旧制人民币），李伟光拍卖了一辆私家车，所得款项全部捐出，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上海市虹口区台籍医生开展义务义诊，半价收医，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捐献。从事家务的女盟员和女台胞，积极参加缝制组赶制用于捐献的蚊帐。上海共有235位盟员和台胞参加捐献，捐款金额达26850万元（旧制人民币），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了力量。

快教你女妹莫要梭。(梭，四川方言，溜开的意思。)种了牛瘟人不错，长了麻子嫁不脱。

新社会少有传染病大流行，但1955年流感流行，我又染上了，那时我在重庆一中念初中三年级。有一个夜晚两千多人的学校病倒了三四百人。次晨学校宣布紧急停课，市里派来了100多人的医疗队。上午9点多钟，我感觉头痛，医生一验体温，39.8度，立即隔离。学校将两栋教学楼改为隔离病房。我进了病房后吃药、打针、喝水、吃饭、换衣、上厕所均有医护人员照料。学校有600多师生感染，全校人人戴口罩，治疗、防护、生活井然有序。一个星期后疫情就结束了，感染者痊愈出病房，再无新感染发生。全校未死亡一人，只是听说一墙之隔的重庆水利学校死了一个。

四度染疫，在痛苦中煎熬，在死亡线上挣扎，我明白了传染病大流行有多么恐怖。在旧社会我三度染疫，除家人外没有任何组织过问过。这次新冠大流行，全国总动员，全民免费核酸检测，全民免费打防疫针，快速修建方舱隔离医院……重症率极低，死亡率更微。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换了人间。

张大嫂，李大哥，

恽代英的处女作

顾燕



恽代英自小读书就非常用功，成绩优异。尤其是在写作上，恽代英更是如有天助。他后来曾说：“近来作文动笔辄数千言，尽日之力万言可致。”只有读得多，腹有诗书，才可做到这一点。

1913年，恽代英考上了位于武昌的中华大学预科班，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人们对这场给整个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议论纷纷，恽代英并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他非常关心时局，也在深入思考这场战争的起因。他写了篇长文《义务论》，1914年10月在上海《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上发表了。这是恽代英的处女作，《恽代英全集》第一篇就是此文。

恽代英在文中指出：“今日欧美上下争轧之祸，大抵由权力论影响而来，是可为前车之鉴也。”人人都想着要争

取自己的权利，而不思承担义务，这就是世界不太平的根本原因。对于列强所认为的文明，恽代英一针见血地揭露他们的文明观：“夫今世所谓文明者，巨大之军舰也，猛烈之炸弹也，一切不可防御之战斗品也，凡此者皆仅以屠戮人类而著名。”百年后的今天读来，这话依然有现实意义。恽代英最后呼吁，“使人类尽忘其机械心，可以永安无患。”恽代英的一生也就是朝着想让人“永安无患”这个方向努力奋斗的，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写此文时，恽代英年仅19岁。《义务论》一文在校园内引起了极大震动，师生们争相传看，大家深深折服于恽代英的世界眼光和缜密思考。当时这篇文章的稿费是大洋10元，而那时一个中学教师的月工资也不过四五十元，这又让人们大惊了一次。

胡适笔下的辜鸿铭

郑学富



1917年，26岁的胡适留美归来，成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当他踌躇满志在北大讲台用英文朗诵荷马史诗时，辜鸿铭毫不留情地予以嘲讽，说胡适的英文是英国下等人的口音。他对胡适倡导的新诗和白话文也冷嘲热讽：“你那首‘黄蝴蝶’写得实在好，以后就尊称你为‘黄蝴蝶’了。”“按白话文，你不该叫胡适之，该叫‘往哪里走’。”

胡适于1919年8月3日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上以笔名“天风”发表一篇《随感录》说：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甩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不归了”。

当胡适把《每周评论》给辜鸿铭看时，辜鸿铭把那张《每周评论》折成几叠，装在衣裳里，郑重其事地向胡适说，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院控告你。



孙犁的短篇小说，在我国现代作家中独树一帜。即使到了晚年，他的文字依然精粹凝练，耐人咀嚼，阅读时，尤其能感到与《聊斋志异》的联系。

孙犁与《聊斋志异》确乎有着深刻联系。据他自己说：“《聊斋志异》这部小说，我不是一口气读完，断断续续读了若干年。”当年印刷业不发达，一部书往往分成多册印出。孙犁读的《聊斋志异》，是石印本，据他介绍，竟然“八本十六卷”。这“八本”，一般人皆不全，只是这家几本，那家几本散着，孙犁也只是“速”着哪本读哪本。“这样，错综连环，经过若干年月，我读完了《聊斋志异》，其中若干篇，读了当然不止一次。”

由于长期浸润，孙犁对《聊斋志异》一书，就有许多精彩判断。他首先认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书，并且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已经“铸为一种”。“其次他认为：“行文和对话的漂亮

修辞，在《聊斋志异》一书屡见不鲜。”并且认为：“非同寻常的修辞，是《聊斋志异》成功的重大因素之一。”

此外，孙犁认为：作者蒲松龄“他的文字生动跳跃，传情状物能力之强，无以复加地简洁精练，形成了《聊斋志异》一书的精神主体。”尽管《聊斋志异》中写入了大量狐鬼形象，孙犁认为，这虽然是时代所致，可蒲松龄突破了“时代和环境的藩篱”。具备着深刻的时代意义。通过深刻的观察体验，蒲松龄纳入自己的故事，“创作出别开生面、富有生机、饶有趣味的艺术品”。在其中，蒲松龄还“刻画了众多的聪明、善良、可爱的妇女形象”。孙犁甚至认为：“这是另一境界的大观园。”

回想孙犁作品中清新的女子形象，我们可以见出《聊斋志异》对孙犁的影响。孙犁的最终评价：这是一部“奇书”，“我是百看不厌的。”

中国第一条单行道

吴熙祥



1905年九月初十，清政府设立巡警部，接管了原京师内外城工巡事务，随后巡警部奏请原京师内外城工巡局更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管理“内外城一切警务”。1906年4月，内城巡警总厅厅丞(即厅长)朱启铃因欣赏许世英的才干，向刑部借调许世英任警务处参事官(后警务处改为行政处，许任行政处金事)。当时，警务处设参事官(从五品，视员外郎)一人，受厅丞指挥，管理本处的一切事务。警务处下设九股，其中交通股负责“车马通行之督查，道路桥梁危险之预防，铁路车站之检查”。

许世英当时巡视外城区域，发现若干地区常发生交通阻塞现象。尤其大栅栏一带来往行人甚多，过往车辆拥挤拥挤，秩序混乱，交通阻塞。于是他下令将大栅栏与珠宝廊这条街改为单行道，车辆由大栅栏进，由珠宝廊出，违者罚款。

这是中国第一条单行道。实行之初，时常有人违反规则。有一天，肃亲王善善福晋到瑞庆祥买东西，不遵守规定，从大栅栏随便进出4次。巡警

当时不敢制止，更不敢罚款。许世英闻讯后，按规定罚了福晋银洋10元。福晋被罚之事告诉了肃亲王，肃亲王听后勃然大怒，于是召了厅丞朱启铃去，又召见了许世英，责问他为何处罚福晋。许世英以理相答：“本朝宗法规定，立法必自亲贵始，盖所以为民众模范。现在巡警厅为了改善全城交通，把大栅栏改为单行道，实行未久，民众尚未能遵行，如今处罚了福晋，可以让民众知道，连肃亲王福晋都要处罚，他们绝对不敢违反交通规则了。我可以保证，从明天起，那边的交通秩序，我一定可以完全改观，政府的命令就可以完全贯彻了。”

肃亲王是官场明白人，听了许世英的一番话，觉得可以理解，便说：“好，只要一直这样认真地做，我一定支持你！”

这一年，许世英因执法无私，年终考核时，列“京察一等”。1907年春，获得以四品任用的资格。巧合的是，同年5月8日，善善福晋为民政部尚书，成了许世英的顶头上司，二人共事一年有余，倒也相安无事。